

由内而外： 意大利历史文化变迁与对华交往^{*}

信美利

【摘 要】意大利在中西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在罗马帝国时代，意大利位于西方世界的中心，以包容的心态向往和想象着东方文明。在罗马帝国解体后，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国家纷争不断。意大利商人灵活、务实且敢于冒险，他们没有效忠王权的观念，致力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之意大利人虽无法迅速有效地完成统一，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文化同质性，这些特性使他们得以长期垄断与东方世界的商贸和宗教往来。在实现国家统一后，意大利人将其在中西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融入民族认同的塑造，但他们放弃了历史上对东方文明开放包容的态度，转而变成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度阻碍了中意关系的正常发展。

【关键词】中西交流 意大利人 意大利史 马可·波罗 利玛窦

【作者简介】信美利，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5) 05-0092-2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意大利统一之后民族国家与治理体系建构研究（1870—1914）”（20CSS030）的阶段性成果。

意大利人在中西交流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现有研究中，学界关于具体人物及其作品的成果十分丰富，尤以对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者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①近年来，国内外的汉学研究还在不断发掘新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以及由他们带回欧洲的历史文献，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②总结这些研究，不禁令人思考，为何意大利人在中西交流史上表现得如此活跃？本文拟梳理意大利人在中西交流史上的活动轨迹，分析其独特之处，考察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进程如何促使他们成为中西交流的先锋和重要推动者。此外，意大利人基于自身在中西交流史上的贡献形成的历史记忆，还深刻影响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意关系，这方面亦不可不察。

一、罗马帝国与使者

在历史上，囿于现实空间的距离，不同民族常常基于对自身的认知，建构遥远的他者的形象。该形象通过口耳相传被记录在册并流传至后世，在再次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时被重新提及和强化，从而形成关于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集体历史记忆。在具体交往中，这种记忆又构成某种相对固定的外交话语与文化心理，影响着个体乃至集体的对外交往决策，意大利与中国便是如此。

在中西交流早期，双方对彼此的认知难免带有想象色彩。加之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故“反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的身上”。^③在公元前后的中西陆路交往中，中国被西方称为“赛里加”（Serice），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而在后来的海路交往中，中国则被称为“秦”（Sin），中国人被称为“秦尼”（Sinai）。此外，中国有时也被称为“丝绸之

① 参见张永沅、白桦：《意大利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钟永宁：《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中华书局2022年版；潘凤娟：《西来孔子艾儒略：更新变化的宗教相遇》，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罗群：《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张西平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国”。^① 在中国史籍中，通常以“大秦”指称罗马帝国的地域。虽然现存史料记载罗马帝国与中国存在使节往来，但是因为缺乏互证，难以查实。例如，据中国史籍记载，公元166年，罗马派出使节取道日南抵达中国；^② 大约在公元280年至289年间，罗马复遣使抵达中国并进献礼物，^③ 但罗马史料于此无证。而罗马史料显示，在奥古斯都时代，一个来自“丝绸之国”的使团历经四年长途跋涉抵达罗马，进献了珍珠、宝石和大象等多种礼物，^④ 但这次出使在中国史籍中并无记载。

公元97年，甘英受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汉书·西域传》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⑤

甘英止步波斯湾，部分中西交通史学者认为是安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刻意阻挠中国与罗马帝国直接联系的结果。^⑥ 对此，意大利汉学家评论道：“甘英大概没有探险家的毅力，听到这些话便放弃前行，折回祖国，结果，他就令人非常惋惜地失去了本可先于马可·波罗的那次壮举好几百年的唯一机会。”^⑦ 实际上，这也许只是后人站在当代立场对历史的一种猜测式批评和假设性遗憾。

促使罗马帝国遣使来华的重要动机是获取丝绸。当时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大约有90%是通过丝绸换取黄金，富有的罗马人将丝绸这种稀有奢侈品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奥古斯都及之后的帝国时期，罗马人对丝绸的需求猛增，一直持续到公元2世纪末。据估计，在戴克里先时代一磅丝绸的

① 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② 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0页。

③ 参见《晋书》卷97《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5页。

④ 参见〔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

⑤ 《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8页。

⑥ 参见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⑦ 〔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页。

价格远高于一盎司黄金。从中国运回的丝绸的价格每经过一个城市都会上涨，因为货物在每个城市都会转交给另一支商队，整个旅程由多支商队接续走完，大约需要两年时间。^① 罗马时代的一些作家，如老普林尼对罗马人将大量钱财用于购买丝绸等奢侈品进行了批评。^②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部分中国学者将丝绸贸易视为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③ 认为罗马帝国“每年支付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的货款达 1 亿塞斯特提”，大部分用来购买中国丝绸，并进而分析道：“比价与黄金相同的中国丝绸，在罗马贸易总额中占有很大比例。到了罗马后期，由于罗马人恣意耗用，黄金大量外流，财政极度困难，称雄一时的罗马帝国，就是在经济陷于崩溃的状况下，走向衰落和瓦解的。”^④

虽然丝绸贸易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一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方面，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对其遣使东方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强盛以及在当时西方的绝对话语权，使罗马人拥有足够的自信，敢于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去探究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在罗马人笔下，中国人的性格温和，他们将货物沿着河岸摊开，并不急于售卖，等待外国人来购买，用货币而非其他货物来支付。中国人的话不多，也不讨价还价，打手势告诉来人，买就买，不买就走开。他们只卖自己的货物，却不买对方的货物。

罗马人对中国的印象部分源自中间民族的转述，其中包含一些真实信息：中国人“充满正义感”，“过着极度平静的生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极为平和”；中国人奉行严刑峻法，整个国家井然有序，“中国人所奉行的法律禁止他们杀人、通奸、卖淫、盗窃和敬拜神像，因此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看

① 参见 Gian Paolo Caselli, Roma, la Cina e la via della seta, Da Roma alla Terza Roma, XXXVIII Seminari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torici, Campidoglio, aprile 2018, <https://www.dirittoestoria.it/17/memorie/Caselli-Roma-Cina-via-della-seta.htm>, 2025 年 1 月 31 日。

② 参见 Antonio Romano, L'Impero romano e la via della seta, <https://www.cinquecolonne.it/limpero-romano-e-la-via-della-seta.html>, 2025 年 1 月 31 日。

③ 参见杨共乐：《“丝绸西销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说”源流辨析》，《史学集刊》2011 年第 1 期，第 69~74 页。

④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2 页。

不到庙宇、神像、妓女、通奸者；没有盗贼被审判，也没有某人被谋杀的记录”；“中国人不知道天主”，“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同时，在这些印象中也掺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如中国人很长寿，最长寿者甚至能活到300岁，而长寿的原因或许与天时、地利以及饮食相关，又如老普林尼称中国人“身高超过中等身材，长着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①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献亦记载罗马人性情温和、关系和谐、普遍长寿，如中国道教经籍《道藏》称大秦国“人民温睦，皆多寿考”。^②此外，中国史籍对罗马帝国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了本土的政治观念与文化期待，《后汉书·西域传》即其著例。该史籍不仅描述大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质直，市无二价”，还详细记载了通往大秦的陆路交通情况，以及使节抵达大秦后所受的礼遇，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西域传》对大秦政治运作机制的记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初始认知，但这种认知显然包含基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想象，如“城中有五宫……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便与汉代的“诣阙上书”制度十分近似，又如“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此处的数字“三十六”与中国古代的职官设置与文化习惯相契合，却与罗马元老院的人数不符。至于“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等记载，^③则既化用了中国上古时代尧舜“禅让”的经典叙事，又融入了汉代诏举贤良方正的选官实践与影响甚广的阴阳灾异学说。

塔西佗在《编年史》中曾提到一句古罗马谚语——“*Major ex longinquo reverentia*”，^④意为越是遥远的事物，往往越受人们敬重。这较好地诠释了全

① 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70、75页；〔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2页。

② 张道陵、阴长生、抱朴子等：《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18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③ 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9~2920页。

④ 〔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在地理上距离遥远，彼此几乎没有直接接触，也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而罗马人需要中国的丝绸，丝绸在罗马文化里是上层地位的象征，于是能够生产丝绸的遥远国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美好想象——在罗马人自身可望而不可即的方面，遥远得如同神话般的民族必然有一些过人之处。同时，罗马人并非单纯仰视中国，而是一种平视，即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另一种文明，这自然与罗马帝国本身的强大有关，也造就了罗马人及后来的意大利人长期延续的文明自信。

罗马帝国解体后，意大利半岛经历了长达千余年的分裂，但半岛上的人们始终保存着对跨地中海伟大帝国的历史记忆，这既为近现代意大利人重塑文明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促使他们对东方世界保持开阔的胸襟和强烈的探知欲望。就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而言，罗马帝国确立了超越意大利半岛的权力架构，其政治遗产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城市自治、地方权力，为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然而，这种帝国记忆也阻碍了君主集权体制的形成，迟滞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随着近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次第兴起，帝国记忆与地方自治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意大利独特的发展轨迹。

二、中世纪城市国家与商人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和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宗教、战争和贸易三种途径实现。意大利与中国远隔千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宗教和贸易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交流载体。意大利人凭借其在这两个领域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定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传统，成为中西交流史上无可取代的先锋和主力。

必须指出，经济繁荣是意大利得以承担上述角色的重要基础。自加洛林王朝时期起，意大利的经济，尤其是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城市人口显著增加。11世纪，意大利各地经济普遍复苏；至12世纪，更因十字军活动而突飞猛进，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从未中断。其中，香料贸易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香料通常由威尼斯或其他海滨城市输入意大利，再经波河平原进入中欧。此外，包括丝织品、地毯、呢绒、金银织物在内的大量成品，以及西方所需的大麻、亚麻等原料从东方涌来，这些贸易主要经波河平原与威尼斯而展开。12—13世纪著名的香槟集市大多由意大利各大市场汇集而成。

1000年左右，伦巴第人与罗马人相互同化，逐渐形成了“意大利人”的共

同身份，^①此种同化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构陆续出现在意大利各城市。例如，工商业人士在城市组建了各种同业行会，这些行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垄断各种经济活动。此外，除了无须现金的汇票，在当时的意大利还诞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附属经济组织和机构，如存放货物的货栈，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以及办理汇兑、储蓄和借贷业务的银行。

“意大利人”的同化还体现在城市国家组织形式的同质化上。意大利语中的城市国家（comune）的原意为“共同利益”，^②在这些城市里，外国的贵族阶层日渐失去统治地位，城市居民重建自治，联合起来捍卫群体利益。在与封建制和教会司法特权的持续斗争中，城市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义务。城市公共生活的最高机构是市民会议，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官，这一名称沿用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旧称，具有缅怀帝国、激励帝国后代的意义。11—12世纪，帕维亚、米兰、科莫、博洛尼亚、皮亚琴察、卢卡、佛罗伦萨等城市先后确立了自治权。

在众多城市国家中，威尼斯共和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公元568年，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大量民众逃离意大利本土，来到其东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礁石群岛避难，威尼斯城即由移民聚居的群岛发展而来。8世纪中叶，在丧失了对拉文纳地区的控制权后，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日渐式微，威尼斯逐步摆脱与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开始利用其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东西方的海上贸易。9世纪中叶，威尼斯成为实际上独立于拜占庭帝国的城市国家。迄于10世纪，威尼斯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舰队，并取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1203年，国力空前强大的威尼斯迫使第四次十字军远征（1202—1204年）根据其利益而改变方向。此后，人口增至10万之众的威尼斯牢牢掌控黑海和亚速海的商贸通道，成为拥有发达的呢绒业、丝织业、造船业、兵器制造业和一支庞大舰队的海上强国。^③

意大利半岛虽然邦国林立，但是彼此之间存在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尽

① 参见[意]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6页。

② 参见[意]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6页。

③ 关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专著、论文颇丰。代表性专著参见[美]威廉·麦克尼尔：《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许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杨乐言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美]弗雷德里克·C.莱恩：《威尼斯：海洋共和国》，谢汉卿、何爱民、苏才隽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年版。代表性论文参见尚洁：《威尼斯城市共和国的公共空间与贵族政治》，《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第53~61页。

管各个城市国家皆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但是对外部世界而言，它们的融合性、同质性远大于差异性——尤其是不满足于对东方的向往和想象，而勇于探索通往东方的道路。当然，得益于蒙古帝国的崛起，这条道路已不像从前那样遥不可及。在持续不断的海外商业活动中，意大利人不仅接触到新的大陆、气候和物产，还接触到一种在远离地中海地区传播的、与自身迥然相异的文明。史料显示，13世纪的中国文人对意大利的认识已不再仅限于罗马，在泉州市舶司官员赵汝适编撰的《诸蕃志》中便有关于西西里的记载：

斯加里野国，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本国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远望则朝烟暮火，近观则火势烈甚，国人相与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抛掷穴中，须臾爆出，碎如浮石。^①

这表明，地中海地区的某些信息可能已经通过商旅活动传入中国沿海城市。由于当时欧洲旅行者大多经陆路来到中国，首先见到的是中国北方的居民，故而“契丹”（写作 Kitan、Kitai、Catai、Cataio、Cattaio）在文艺复兴时期常被用来指称中国，如薄伽丘在《十日谈》里写道：“据某些到过契丹的热那亚人或者意大利其他城市的人所说，那个国度有个贵族出身、家资巨万的名叫纳坦的富人。”^②

在对东方的商业贸易中，意大利人不仅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还在其他方面做了充分准备。14—15世纪，意大利人在经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业者自幼便开始接受商业教育，他们先学习打算盘和算术的基础知识，随后进入作坊学习行业秘诀，积累资历。此外，从商的行为举止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一些古老的商人家族还有其恪守的行事规范。卓越的商人不但是优秀的簿记员，而且往往具有出众的人文素养，15世纪就出现了许多能熟练运用拉丁语知识并热衷于收集手抄本的意大利商人。^③他们擅长与公职人员（尤其是外交官员）及其他各色人等打交道，逐利的本性使之行事灵活，而较高的人文素养则造就了其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特质在马可·波罗等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①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3页。

② [意]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

③ 参见 Paolo Brezzi, *Storia d'Italia dalla civiltà latina alla nostra Repubblica*, Vol.IV, *Dai Comuni alle Signorie (1250/1500)*, Novara: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80, p.262。

除了以上学习途径,当时市面上还有一些专供商人使用的学习手册。佛罗伦萨巴尔迪商行^①(*la compagnia dei Bardi*)的一位职员——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1318—1321年任伦敦分行经理)将自己和同事的工作经验整理编撰成一本名为《国家区划、经商标准及其他商人须知事项》(*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esi e di misure de' mercantie e d'altre cose bisognevoli di sapere a' mercadanti*)的书,俗称《贸易实践手册》(*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指导前往世界各地的意大利商人如何旅行,其中就包括他从未去过的“契丹”。他为从陆路去往“契丹”的商人提供了不少建议和信
息,如“自备面粉和咸鱼,其他的食物,特别是肉,那里则有很多”,“从塔那到契丹的这一条路,据走过这条路的商人们说,那里昼夜都很安全”,以及要事先算好往返的费用等。^②

还有两本类似的手册,一本名为《关于不同地区的货币和度量衡》(*Libro di gabelle e pesi e misure di più e diversi luoghi*),作者据传是佛罗伦萨人乔瓦尼·迪安东尼奥·乌扎诺(Giovanni di Antonio Uzzano);另一本名为《关于各国、各地区的习俗、交往、钱币、度量衡和买卖条款》(*Libro di tucti costumi, cambi, monete, pesi et usanze di lectere di cambi et termini di dette lectere che nei paesi si chostuma et in diverse terre*),作者(或者该书的抄写者)乔治·迪洛伦佐·齐亚里尼(Giorgio di Lorenzo Chiarini)也是佛罗伦萨人。^③可以想见,在这些手册出版以前,已经有不少意大利商人往来于东西方之间,他们不仅为相关著述提供了实践依据,还帮助更多人拓宽了视野,卸下了其前往东方的心理负担,从而拉近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

西方文献里留下了一些留居中国的意大利商人的名字,他们是这股东行热潮的印证。这些商人主要来自热那亚和威尼斯,其中有的人到过北京,有

① 著名的巴尔迪家族自12世纪起就居住在佛罗伦萨城,从13世纪直至14世纪中叶,巴尔迪家族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商业家族之一,广涉商业和银行业,并在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开始干预政治,其家族成员一般都是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多次出任主教、执政团等职务。134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拒绝偿还其在百年战争第一阶段欠下的债务,巴尔迪商行也因此一蹶不振。

② 参见[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35页。

③ 参见Paolo Brezzi, *Storia d'Italia dalla civiltà latina alla nostra Repubblica*, Vol.IV, *Dai Comuni alle Signorie (1250/1500)*, Novara: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80, p.263。

的人甚至与中国女性通婚并定居下来。20 世纪 50 年代，扬州出土的两块墓碑分别镌刻有圣母怀抱耶稣像和圣女（S. Caterina）殉教图，^① 证实某个意大利家庭曾在中国长期生活直至终老。

意大利商人能够长期往来于东西方，既得益于他们娴熟的远洋航行技术，也与其不畏艰险、灵活务实的特点有关。在这一群体中，写下中西交流史上辉煌灿烂一页的马可·波罗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员，而且他不仅仅具有商人身份。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马可·波罗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在职三年，其驻所就是预备远征日本的主要根据地，“以如是重要的地位委任马可波罗，足证他颇受大汗的宠任。又如他所记远征日本舰队的情形，以及他所闻此国的资力，又足证明他注意此国颇为深切”。^② 为了满足大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马可·波罗欣然成为其耳目，“他人甚聪明，凡事皆能理会，大汗欲重用之。所以大汗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③ 大汗喜知各地人情风俗，马可·波罗于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向大汗汇报。马可·波罗在大汗所 17 年，常奉命出使各地。《马可波罗行记》记载：

每次奉使归来，报告详明。所以大汗颇宠爱之。凡有大命，常派之前往远地，他每次皆能尽职。所以大汗尤宠之，待遇优渥，置之左右，致有侍臣数人颇妬其宠。马可波罗阁下因是习知世界各地之事尤力。尤专事访询，以备向大汗陈述。^④

马可·波罗得以践行务实的“上层路线”，与其从小接受的教育与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对当时的意大利商人而言，他们无须将精力和感情投入对某个权力的效忠，城市国家虽然是他们的“祖国”，但是还远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祖国的含义，各个城市国家至少在名义上也不是王权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都是共和国。城市国家虽然彼此争斗不休，但是即使发生战争，也并非毁灭性战争，如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但之后又被放回。城市国家的人们在宗教、血缘、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同质性，

① 参见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 年第 6 期，第 532~536 页。

② [法]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叙言”，第 7 页。

③ [法]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7 页。

④ [法]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9 页。

这种同质性也表现在他们都更加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致力于实现个人价值，以及获得物质利益或实际权利，而且在他们看来，获得成功的方式往往可以不拘一格。这种“上层路线”在意大利人的宗教交流活动中也有突出体现，凭借灵活务实的策略，意大利传教士将他们在东方的活动维持了几个世纪。

三、远道而来的传教士

作为天主教的中心，意大利孕育了许多虔诚的信徒，强烈的传教热忱支撑着他们不畏艰险、远涉重洋来到东方，其中部分人的东行甚至早于马可·波罗。在元代来华的欧洲旅行家中，仅来自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就有五位，分别是柏朗嘉宾（Giovanni dal Pian del Carpine）、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安德烈亚（Andrea da Perugia）、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和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①

柏朗嘉宾于1182年出生在意大利佩鲁贾的贵族家庭，他学识渊博，既是圣方济各的挚友，也是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之一。1245年，柏朗嘉宾以63岁的高龄奉教宗之令出使蒙古，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说服当时一路打到威尼斯边界的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并停止向西进攻，与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柏朗嘉宾在蒙古驻留三年，虽然最终并未完成教廷赋予的使命，但是他用拉丁文撰写的《蒙古行纪》详细记录了蒙古和“契丹”的山川地理、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情况，尤其是蒙古军队的结构、武器、战术，深入探讨了如何与蒙古军队作战等问题。相较宗教特使的职责，柏朗嘉宾更多完成的是情报搜集工作。他力图说明蒙古人正准备乘胜进一步扩张，为了自卫，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应该联合起来，借鉴蒙古人的战争策略，以至于有人评价道：“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第一代方济各会士竟丝毫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因为传教士一般最热心的是拯救人们的灵魂。但他却更为倾向于以一位特使的感情来叙说。”^②

柏朗嘉宾认为，蒙古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者，他

① 参见〔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页。

② 〔法〕贝凯、韩百诗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导论”，第12~13页。

们很少争吵，也很少出现暴力行为，几乎不存在斗殴、凶杀或偷盗现象。他们热情好客，互相尊重，乐于分享食物，并且非常刻苦耐劳。^①

鄂多立克是现代汉学家眼中影响力仅次于马可·波罗的人物。1318年，作为方济各会士的他开始东行，1321年抵达西印度，继而通过海路进入中国。大约在1322年到1328年，鄂多立克周游中国各地，返回意大利后于1331年1月去世。^②与鄂多立克同时代的传教士还有孟高维诺，他以教宗特使身份于1290年从意大利出发，经海路抵达中国。他的足迹遍布中国，还曾在北京受到元成宗的接见，尽管他没能成功说服大汗改宗天主教，但是教会仍然高度认可他在中国的活动，任命他为北京总主教。此后，他定居北京，直至去世。另一位传教士安德烈亚亦在1309年至1313年间到过北京，并于1323年被任命为泉州主教，1332年在泉州去世，其墓碑至今仍存于泉州。这些传教士对蒙古官员宽容的宗教态度十分赞赏，但是他们在传教方面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③在耶稣会来华之前，方济各和多明我两派教士虽极力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未能取得持久的成果。直至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才终于有所突破，而这同样与意大利传教士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葡萄牙为代表的由专制王权主导的西方国家，最初企图通过展示武力提升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自葡萄牙人以晒海货为名在澳门长期驻扎起，澳门就逐渐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重要枢纽。葡萄牙人宣称在整个东方拥有护教权，但在意大利传教士看来，诉诸武力根本无助于实现传教目的，“葡萄牙人曾渡过浩瀚无际的海域，使自己来到已知的极东地区，他们最后驻足于中国海滨。他们熟知这个国家的财富，想尽各种办法诱使它的百姓进行贸易交往。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的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的大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④于是，意大利传教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① 参见[法]贝凯、韩百诗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36页。

② 参见[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9年版，“中译者前言”，第29页。

③ 参见[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4~45页。

④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140页。

耶稣会在东方传教的负责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天资聪颖、精力充沛，他对域外种族和传教步骤的见解深刻影响了利玛窦。^① 范礼安于1578年9月抵达澳门，他很快便意识到，葡萄牙和西班牙那种诉诸武力的传教方式并不可取，这两国的宗教人员深受国家利益、种族偏见和僵化思维左右，不易妥协，而且对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缺乏兴趣。因此，他向上级会院请求调派两名年轻的耶稣会士来澳门学习语言，并特别强调必须是意大利人，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没有民族主义偏见，所以更适合担此重任。^②

范礼安确立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路线”。第一个践行该路线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他于1579年7月抵达澳门，随即按照范礼安的规划开始做准备工作，重中之重是学习汉语。罗明坚跟随葡萄牙商人与中国人进行交易，除了特别关注在此过程中遇到的中国官员，他还有意挑选一些社会名流进行接触。当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罗明坚出现在每年于广州举行的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中国官员发现他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经过两年的交往，罗明坚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获准在当时两广总督的所在地肇庆长期居住。1583年，罗明坚来到肇庆，随后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将其命名为“仙华寺”。在罗明坚的认识里，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若皇帝不认可基督教，则基督教不可能在此有大的发展。罗明坚希望由教宗亲自出面，给中国皇帝写信，并准备借此机会携厚礼觐见中国皇帝，以赢得其好感，进而提出传教计划。为此，罗明坚返回欧洲，不料梵蒂冈教宗接连病故，他所请之事也因此被耽搁下来，最终他逝世于故乡那不勒斯。

利玛窦也因范礼安的安排而来到中国，并在罗明坚的工作成果基础上开展活动。作为教廷视察员的范礼安认为，“从事这桩特殊的劳动”，利玛窦有着“决定性的便利条件”。^③ 具体而言，利玛窦主要通过两方面举措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一方面，他脱去袈裟，换上儒袍，一改过去传教士“西僧”的面貌，“合儒易佛”。他不仅出门坐轿，而且像儒生一样饱读诗书，

① 参见[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章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② 参见[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4~85页。

③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7页。

出入文人墨客之间，很快以“西儒”之誉名动江南。另一方面，他定居北京，以接近明王朝的权力中心。1601年，利玛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从此成为万历皇帝的门客。他虽然并未面见万历皇帝，也从未参与朝中之事，但是在文人中颇有影响，“不仅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晚明重臣投于他的门下，就是像李贽这样的另类文人也很欣赏他的才华”。^①

从交往策略看，马可·波罗与利玛窦存在一脉相承之处。马可·波罗依托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彰显了贸易途径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但他的活动早已超出单纯的商贸范畴。他发挥自身所长，积极迎合元朝统治者的需求，通过与上层建立较为稳固的私人关系，水到渠成地实现了个人目的和价值。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则经由宗教途径展开活动，其背后是意大利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他们的动机是传教，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方式灵活而务实。基于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的充分认识，他们采取了在当时最适宜的行动策略。商人和传教士，前者追求世俗利益，后者致力于“灵魂拯救”，二者看似相互矛盾，但在与东方文明的对话中形成了深层次的“统一”。

这种富有张力的“统一”实则体现了意大利历史的特殊之处。意大利半岛长期处于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态，各城市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彼此混战。由于任何一个城市国家都无法取得压倒性胜利，故而它们需要在内外多重势力博弈的夹缝中生存，利用半岛乃至整个西欧的矛盾达成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国家又存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彼此紧密相联，既无法完全分裂，又难以顺利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王国。这种历史渊源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为意大利人承担非民族性的使命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不会因民族偏见或狭隘的国家认同而鄙视、排斥遥远的东方文明，反而能够更加开放地与之进行交流。

总之，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历史，还是基督教信仰，抑或前文并未涉及的人文主义传统，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意大利人形成了对东方文明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也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意大利人的行事方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手段灵活，善于审时度势。意大利人的政治手腕，尤其是外交妥协的传统，可以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思想中找

^① 张西平：《跟随利玛窦来中国：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10页。

到源头，他们都认同一个核心原则：“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争取成功都是绝对必要的、唯一正确的目标。”^①

四、意大利王国与外交官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实现统一，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关于意大利过去扮演的中西交流使者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在促进国际交通、世界贸易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伊士运河极大缩短了印度与欧洲之间的通航时间，并降低了各项费用支出。^②这一发展机遇引起了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的高度重视。

1872年，一本名为《意大利与东方贸易简论》的小册子在罗马出版，表明意大利人重新燃起了经营东方贸易的热情。该书试图唤起官方与民间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注，其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强调意大利“注定要成为中欧、西欧和北欧与东方国家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以及“从欧洲到东方和从东方到欧洲所有货物交换的供应点”——作为地中海沿岸国家，意大利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其港口在过去曾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也将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贸易枢纽。^③

该书特别指出，统一后的意大利在铁路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后有望连通欧洲大陆与地中海地区，并经由苏伊士运河、红海直达东方，因为苏伊士运河使东方国家“与意大利海岸仿佛近在咫尺”，“为了不浪费我们拥有的所有优势，为了不让当下这场巨大的商业潮流仅仅带来目送外国船只只在我们的海岸来回穿梭的乐趣，而不能给意大利带来任何其他结果，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必须采取行动。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有许多工作要做，每个

① [意]路易吉·巴尔齐尼：《意大利人》，刘万钧、张天润、张军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9页。

② 参见 John Adams, *The Impact of the Suez Canal on India's Trad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8, 1971, p. 235; 吕桂霞：《苏伊士运河与大英帝国的兴衰》，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3~73页。

③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p. 9-10。

人都有责任利用好我们的好运气”，^①“如果有哪个国家因时运而获得商业繁荣的契机，那无疑是意大利；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坐失如此多的优势，而无法摆脱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面前的劣势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活力都已熄灭，所有能力都已消失，我们只能吞下苦果，在祖先凋零的桂冠边永世沉眠”。^②

这种对意大利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追忆，也是对意大利辉煌过去的怀念，是意大利人心中对“黄金时代”已逝的怅惘，“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商业往来中，意大利曾经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而今）它几乎就像那些无足轻重的小村庄一样，如果不是碰巧位于连接某个重要中心和火车站的线路上，它就会被整个世界遗忘”。^③对东方的贸易曾为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渴望复兴的意大利人满心期待着能够失而复得，“如果说意大利的条件、状况和特质明确地表明它有什么事业的话，那就是东方贸易事业。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这是意大利恢复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唯一可靠途径，意大利过去如此强大，现在却完全丧失了这种实力”。^④

该书作者认为，作为“伟大榜样”的英国本身并没有生产多少商品，但其商业触角遍布全球，他们收集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所有产品，并将之与欧洲国家最受欢迎的产品进行交换。通过此类贸易活动，英国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丰厚的利润和巨大的财富积累，从而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⑤相比之下，意大利则远远落后，迟至1868年，意大利仍未通过地中海与任何东方国家有贸易往来。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商人如要运货，不必说运往印度或中国，哪怕只是运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也必须使用法国蒸汽船。更令人惊讶的是运货路线，从亚历山大港往意大利港口运货，往往要先运到法国马赛，再从那里转运至意大利。由此便不难理解，这位作者为何对英国的殖民商业霸权羡慕不已，并希望意大利效法英国。

该书还指出，意大利人习惯于盲目地涌入银行投机，却很少甚至根本没

①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p. 9–10.

②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11.

③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25.

④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49.

⑤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p. 11–12。

有意识到与东方开展贸易的重要性。^①意大利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政府应该提供足够支持,改善港口条件,构建从陆路到海路的便捷运输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消除物质、法律以及习俗上仍然存在的障碍,那么“使意大利成为欧洲和东方之间庞大贸易往来的纽带”将指日可待。^②此外,意大利还应充分发挥其自然禀赋优势,注重科学发展,以推动生产领域的进步,同时认真研究目标市场的实际需求,将具有本国特色的产品推向世界。^③

这本小册子还简要介绍了几个东方国家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连同其附属国,面积是意大利的40倍,人口达5.3亿,甚至更多。中国的主要港口广州有100万居民,其次是上海和香港,香港在英国人手中。中国主要出口茶叶、丝绸、肉桂、茴香、大黄、楠木、樟脑等商品”。作者对印度和日本着墨多于中国,“如果说迄今为止加尔各答一直稳坐贸易的头把交椅,那么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个位置将会让给离欧洲更近的孟买。没有人不知道英属印度领地的贸易量有多么巨大,我们提供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日本,“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富饶、农产品最丰富的国家”。^④

通过这本小册子可以清晰看到,在意大利统一后,其国内有识之士不仅对本国发展充满忧思,而且对开拓东方贸易表现出强烈的紧迫感。实际上,意大利并非完全忽视与东方的联系。1858年,时任首相加富尔以撒丁国王的名义授予一位英国商人“荣誉顾问”称号,委托其全权代办王国在华事务。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66年10月26日,中意《通商条约》(*Trattato di amicizia, di commercio e di navigazione*)签订,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但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不过意味着又增加了一个在华逐利的列强。条约由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意大利使臣阿尔明雍

①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24。

②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56。

③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 58。

④ 参见 *Il commercio tra l'Italia e l'Oriente: Brevi appunti*, Roma: Regia Tipografia, 1872, pp. 79–80。

(Vittorio Arminjon) 签于北京。^① 意大利这个刚刚实现统一的欧洲国家也试图加入瓜分在华利益的行列，与其他列强一样攫取包括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多项特权。意大利在纸面上获得了与其他列强基本相同的在华特权地位，实际上却并不具备与其他列强一较高下的实力。在统一后的 30 年里，意大利工业虽有明显发展，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即使在发展最快的那些年里，意大利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也不曾达到其它国家在同一时期所达到的更高得多的增长率”。^②

1899 年 2 月，意大利效仿英、法、俄强租中国沿海地区的“先例”，^③ 企图强租浙江三门湾，但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意大利无力单独出兵威吓清政府，加之英国并不赞成此做法，“奉劝”意大利放弃，故这一扩张计划以失败告终。意大利在外交上颜面尽失，驻北京公使被召回，其国内舆论对政府十分不满，首相佩卢 (Pelloux) 不得不撤换外交部长，并改组政府。^④ 三门湾事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罕见的外交胜利，在中意两国及当时的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强烈反响。^⑤ 强租三门湾失败之后，意大利继续寻找各种机会在中国进行渗透扩张。1900 年，意大利利用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的时机，派兵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最终抢夺到约 6% 的庚子赔款和 0.5 平方公里的天津租界。^⑥

有学者认为，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的失败既暴露出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又“十分荒唐”地拉近了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距离。^⑦ 此后，越

①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46~257 页。

② [意] 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4 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王铁生、王禹、袁广伟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66 页。

③ 1897—1898 年，列强在中国强租以下地区：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德国租借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为界地区。

④ 参见 [意] 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60~261 页。

⑤ 参见倪侃：《“三门湾事件”述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76~77 页。

⑥ 参见 Daniele Comberiati, *La colonia cinese: le rappresentazioni culturali e letterarie del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sin nella letteratura e nella cultura italiana del Novecento*, *Forum Italicum*, Vol. 48(3), 2014, pp. 398-410; Laura Rampazzo, *Un pizzico d'Italia nel cuore della Cina: la concessione di Tianjin*, *Tesi di Laurea magistrale*,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2011/2012.

⑦ 参见 [意] 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85 页。

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意大利，一批关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物的著作相继出版。例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着重突出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特别关注加富尔，而加里波第的“神话”一直持续到1911年。《申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等重要报纸、杂志也刊登了大量介绍意大利的文章。之所以出现这种盛况，是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看来，与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推行着更加彻底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其他欧洲列强相比，意大利更像中国。意大利虽然在政治上弱小，经济上落后，但19世纪时却屡次能够从欧洲强国的桎梏下摆脱出来”。^①

在中国近代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眼中，意大利既是列强中的末流，也是中国的参照对象，因为它同样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文明古国，经过奋起直追，才实现了国家统一和复兴。

1881年，清政府决定设立驻意大利使馆，首位驻意公使许景澄于1884年上任，1888年由刘瑞芬继任。1890年，清政府派遣大理寺大堂、钦差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于次年3月11日至4月3日在意大利短暂停留，他撰写了内容较为详尽的出使日记。在日记中，薛福成将欧洲各国划分为四个等级，意大利虽属于其中的“二等”，但颇具潜力：“今欧罗巴一洲，有头等之国五：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奥。二等之国四：曰意大利，曰荷兰，曰西班牙，曰土耳其；意国虽在二等，骎骎乎有欲列头等之势。”^②

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则更为关注意大利与中国的相似性——“概而论之，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认为“意之地荒人多，与中国同；贫乏少用机器，与中国同；古国多旧俗，与中国同；迁徙殖民，亦与中国同；工商未盛，亦与中国同。故意之变法，我国亦可采择焉”。^③此时的中国正迫切寻求摆脱列强桎梏、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在这些观察者看来，意大利既与中国存在诸多相似性，其复兴之路自然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进入20世纪，中意两国的“亲近感”也因对马可·波罗的历史记忆而得到强化。在马可·波罗的光环之下，20世纪前期来华的意大利人在沿袭他们

① [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5页。

② 薛福成著，宝海校注：《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③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94页。

某些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偏见。

在意大利驻华公使华蕾（Daniele Varè，1928—1931年在任）的描述中，许多外国人受到所谓“远东魅力”的吸引而来到中国，但他们对东方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甚至一无所知，在这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大陆”，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一样旅行，探索陌生的地区”。^①

后来升任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曾担任驻华外交官，他对中国的观感带有明显的傲慢和优越感。1927年，齐亚诺被任命为意大利驻华公使秘书，首次来到中国，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提到，“这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同”，“很少有东西能与我们的拉丁精神相媲美”。对中国人的秉性和中国文化，齐亚诺也有一番评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是一个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广阔天地”，中国人勤劳、善良，尊崇儒家思想，但亦不乏革命热情。^②

1930年，齐亚诺在与墨索里尼之女埃达·墨索里尼（Edda Mussolini）完婚后回到中国，担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之后又升任驻华公使，直至1933年11月返回罗马。在此期间，齐亚诺积极结交国民党高层以及各国外交使节和来华名流，偕夫人埃达在上海展开了一系列“宴饮外交”（diplomazia culinaria）。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外交政策倾向于提高其国际声望，努力使意大利摆脱昔日的“小意大利”形象。^③为达成这一目标，常驻上海的齐亚诺夫妇充当了墨索里尼的传声筒，为建立“法西斯神话”而不停奔走。^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齐亚诺夫妇与张学良私交甚笃。据埃达回忆，1932年6月的一张军售订单——涉及蓝旗亚（Lancia）生产的一批装甲车和6架菲亚特BR3型轰炸机——就是与张学良签署的。^⑤可以看到，齐亚诺采取的在华活动方式不仅有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意图，而且延续了意大利人传统的“上层路线”。然而，他对中国的态度流露出其出身于“拉丁民族”的傲慢和优越

① 参见 Daniele Varè, *Il diplomatico sorridente*, Verona: Mondadori, 1941, p. 393。

② 参见 R. Maria Oliver, *La vida cotidia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69, pp. 221–222。

③ 参见 Giordano B. Guerri, *Galeazzo Ciano. Una vita 1903/1944*, Milano: Bompiani, 1979, p. 150。

④ 参见 Vincenzo Moccia, *La Cina di Ciano: La diplomazia fascista in Estremo Oriente*, Padova: libreriauniversitaria.it edizioni, 2000, p. 85。

⑤ 参见 A. Spinosa, *Edda: una tragedia italiana*, Milano: Mondadori, 1993, pp. 131–132。

感，这种态度显然受到了意大利法西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影响。即便是一个落后的“帝国”，意大利也希望在东方世界彰显其地位。

不过，在官方会面的场合，意大利人深知如何措辞能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从而维持“平等”对待东方文明的表面立场。以宋子文访意为例，1933年7月13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罗马，他从法国巴黎乘火车抵达罗马，当时辞职出国、正在意大利游历的张学良前往车站迎接。当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在威尼斯宫与墨索里尼会面。^①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墨索里尼在晚宴致辞中提到，“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先驱，意大利在西方文明史上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东西方两种文明经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得以相遇”。宋子文则回应称，意大利既实现了国内的“和谐安定”，也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通过牺牲拼搏和团结奋进，中国亦可在国际社会重获公正合法之地位。^②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明确认识到马可·波罗在对华交往中的作用，将之视为一张屡试不爽的“历史牌”。他们强调意大利与中国各自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旨在恭维中国政府，另一方面也间接道出法西斯政权重建“帝国”的野心。

五、结语

意大利人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就地理位置而言，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心地带，具有先天的交通优势。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意大利是西方世界的天然中心。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奠定了意大利人对西方世界的基本认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帝国都凌驾于所有城市与王国之上。作为一个地理区域，意大利理所当然地属于帝国，而帝国则是意大利人所有荣光和骄傲的源头。因此，西方与东方的最初联系是由位于西方中心的意大利人建立的，对东方的向往和较为包容的心态实际上也成为后来意大利人帝国记忆的一部分。

罗马帝国解体后，意大利人在漫长的中世纪形成了自身作为天主教中心

① 参见 Viaggio di T.V. Soong in Europa, *Tokio Asahi*, 15 luglio 1933; *Japan Times*, 14 luglio 1933 (pubblicato anche da altri giornali), Busta 30, Affari Politici 1931–45 (Cina), Archivio Storico de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② 参见 Viaggio di T.V. Soong in Europa, *Tokio Asahi*, 16 luglio 1933, Busta 30, Affari Politici 1931–45 (Cina), Archivio Storico de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的认知。在天主教的影响下，意大利半岛出现城市国家纷争不断的局面。意大利商人灵活、务实且敢于冒险，他们没有效忠王权的观念，致力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这种特点持续影响着近现代意大利的历史进程。加之意大利人虽无法迅速有效地完成统一，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文化同质性，这使他们得以长期垄断与东方的商贸和宗教往来，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正是相应的代表人物。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现代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开始形成。在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除了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璀璨文化，意大利在中西交流史上起到的关键作用也被纳入国家叙事，以激励民族共同体奋发向上，实现国家复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意大利衰落的本质原因，而是试图通过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恢复昔日荣光。于是，他们放弃了历史上那种对东方文明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西方列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中国，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马可·波罗的历史遗产扩大在华影响力。当时的中国迫切希望从西方找到富国强兵的方法，作为西方文明古国的意大利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再至于统一的过程，这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具有参考意义。因此，尽管20世纪前期意大利的在华利益相对有限，双方经贸往来的规模较小，但是民国政府仍对借鉴意大利的强国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由此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意关系的“黄金时期”(anni d'oro)。^①不过，这种打着互利幌子的“合作”的本质依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掠夺。在意大利与日本缔结法西斯同盟后，墨索里尼便撤走了所有来华使团，从而阻断了中意关系的正常发展。总之，以上内容有助于理解中西交流的历史脉络，并为思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模式提供有益参照。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意大利史学家萨马拉尼的这一提法重在说明，20世纪30年代中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往来尤其频繁密切，在中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参见 Guido Samarani e Laura De Giorgi, *Lontane, vicine: Le relazioni fra Cina e Italia nel Novecento*, Roma: Carocci editore, 2011, pp. 57–74; Guido Samarani, *The Italian Presence in China: Historical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1902–1947)*, in Maurizio Marinelli and Giovanni Andornino, eds.,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49–66。